从“寄予厚望”到“破车一辆”

——国民参政会的若干史实

王新尚

国民参政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相当重要的政治影响，增进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小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合作，在实际上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一些重要政策阐述均与之相关。

在危机中设立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新组建的国防最高会议下面设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拟收集思广益、支持抗战之效，但成员几经扩充也不过75人，难负抗战民意机关重任。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事实上正式形成后，动员全民族团结抗日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统战组织或民意机构。国防参议会难当大任，国民大会又因战争无限期延后，此前共产党所提议的民族统一联盟又不被国民党所接纳，这就需要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来代替。

12月21日晚上，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面见蒋介石，商讨推进国共合作时表示：中共愿意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以团结全国抗战。蒋介石赞同这一意见。

迫于抗战形势带来的巨大统治危机，国民党决定于1938年3月29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问题。3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书记王明起草了一份建议书：《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团结抗日、健全民意机关、动员和组织民众等三方面建议。

关于健全民意机关，《提议》指出：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更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各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的代表，同时此机关要真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虽然这份提议未经中共中央讨论同意，但终究以中共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

步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尘，国民党临全大会也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从外交、军事、政治等方面对抗战建国做了规划。其中明确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3月31日，临全大会正式通过《设国民参政会案》，明确指出国民参政会是在非常时期设立的，其职权和组织方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妥订法规。

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案》，开始组织参政会。

不是统战组织

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7月6日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48年3月在南京“破车不能再开”，三迁会址、历经四届，共召开13次全体会议。

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设置，是处于政府之内的，所有重大事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最终决定权。实际运作也是如此，组织条例修订、人员增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会需由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包括毛泽东等在内有党派身份的参政员，是以“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而被选任、以个人身份出席会议的，并非以本党派名义或代表党派。同时，参政员并非经过公民普选或各党派团体协商推荐产生，除第二至四届的地方各省（市）人选由所在省（市）临时参议会间接选举外，其余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定。

国民参政会虽有决议政府施政方针、提出建议、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提出询问案等权力，甚至后来又增加了调查权和初审国家预算权，但其提案、议案经大会审议通过后，对政府并不具有约束力。1944年9月抗战渐趋结束时，参政员黄炎培在其《国民参政会六年九次大会的客观检讨》中回顾历次会议成果后认为：“六年九次集会之结果，究竟对于抗战建国，贡献有无、多少，就客观的判断，虽不得为‘无’，也许不能不感为‘少’。”

毛泽东等7位共产党参政员在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青年党参政员曾琦从正面角度说：“参政会虽然不是纯粹的民意机关，但至少是准民意机关。”国社党参政员罗隆基认为：“参政会在人选方面，我们不能说完全满足人民之意。”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还是囊括了中国各主要党派和各方面代表人物。除共产党外，其他如后来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三党三派领导人物以及较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也被邀请。因此，一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国内舆论给予高度评价，寄予热切期望。中共参政员发表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评认为：“我们相信这个统一团结的表示，在精神上给予敌人的打击，不啻十万大兵！这是国民参政会的最大收获，也是我们国家的极大成功。”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指出，参政会之召集，“可正告敌人：中国将继续抗战到底，争得最后胜利，以击破敌人新的引诱阴谋”。其他各党派和进步人士这一时期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共产党同中间党派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同中间各小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合作，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为坚持抗战、团结、民主，反对妥协、分裂、独裁而进行的合作。

在一届二次会议召开前，武汉、广州失陷，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连续对记者发表谈话，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会议开幕后，来自中共、救国会、第三党、职教派、乡村建设派等方面的参政员73人联合提案，以“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为口号，孤立打击汪精卫集团。华侨参政员陈嘉庚身在海外未能莅会，但是发来了一句话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有超过20人迅速联署了这一要求。按惯例，提案付诸会议讨论时，需由议长在大会宣读题目，汪精卫在宣读“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时，面色变得苍白，在激烈讨论期间神情非常不安。这一时期，共产党和各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围绕团结抗战这一主题，相互配合，有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9月一届四次会议召开前，面对国民党实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形势，共产党和各小党派参政员就国民参政会提案加强了沟通。据参政员邹韬奋回忆：“大家交换意见及商讨研究的结果，认为如果真正实行宪法，实现民主政治，便可制止危机，使国家走上康庄大道，于是各方分头起草关于这件事的提案。”四次会上，共产党和各小党派参政员共联署提出了6个关于民主政治的提案，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治、结束党治、保障党派合法地位、施行宪政。蒋介石一看情形不对，便下令让国民党参政员孔庚也提出了一份不到100字的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经过激烈辩论，七案合并审查，大会最终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的决议案。

国民参政会每次会议提案多则400余件，少则八九十件，覆盖各个方面，但具体实施了多少，实际效果如何？1939年2月重庆《大公报》就警告：“国家既饥且渴，需食需饮，而不需多读菜单。国民参政会隔三月一开，议员忙提案，院部忙答复，假若不更为统一的确实的规划与调整，则若干议案，必然限于纸上文章。参政会以菜单去，各院部又以菜单来，依然不能使国家充饥止渴。”邹韬奋因生活书店屡次被封，在二届一次会议前愤而辞任参政员，怒斥“提议等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参政员钱端升等人1944年9月在三届三次会议上提案称：“本会历届之建议事项，论其内容与文辞，无不头头是道，件件皆通。苟其中有十分之一二真获实施，情势必远胜于今日，而隐患亦可以不萌。”

两次反共高潮的影响

国民参政会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诞生，在团结抗战和摩擦分裂中发展，在反共内战的喧嚣中沦为国民党御用工具，其历史大略可划分为前（主要是1938年至1940年第一届会议时期）、中（1941年二届一次会议至1944年三届三次会议）、后（1945年至1948年的第四届会议期间）三个时期。这当中，国民党发动的前两次反共高潮是重要转折点。

第一次反共高潮改变了中共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在此之前，中共把国民参政会作为国民党刷新政治的重要开端和基础，努力借此推动国民党向进步方向转变。首次会议召开前，中共的7位参政员声明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在前四次会议上共领衔提交了12件提案。随着1939年冬至1940年春出现国民党军队围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事态，毛泽东2月份一度指示拒绝出席4月召开的一届五次会议。尽管后来为了维护团结大局，董必武等人出席了会议，但中共从此再也没有在会上领衔提过提案，对国民党也开始从正面引导为主，转为批评斗争为主，当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国共合作、实现团结抗战与国内和平。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改变了国民参政会的命运。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在此之前，虽经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我们党在参政会主要还是展现团结合作的态度，各小党派对国民党也都抱有一些幻想，国民参政会的主导方面仍然是团结抗战。事变之后，各小党派深感惊惧和失望，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加强了内部联合。共产党参政员则拒绝参加二届一次会议，后虽参加了二届二次会议和三届的会议，但国民参政会的进步性逐渐丧失，开始成为国民党压迫钳制抹黑共产党的平台，国共双方在参政会上的政治斗争愈见剧烈。

民盟等中间党派更加倾向共产党，在会上注意同中共协调立场、加强合作。其领导人罗隆基在1945年5月抨击道：国民参政会不过是国民党政府用来掩饰国际视听的一种工具，对于国内党派团结实不能起任何作用，而且“绝不能引起社会上任何良好印象”。同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发言人就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发表谈话称：“参政会由点缀门面渐变而为御用机关之后，其开会与否，本与国计民生无干，久已为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所不重视。”旧政协五项协议被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后，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的把控下作出拥护二中全会的决议。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

到了1948年3月，正如新华日报社论所说，这辆破车已经不能再开了。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秘书长）

半世纪末公布身份的党员

李军涛　许娜　本报记者　王有强

河南省开封双龙巷历史文化街区，浓缩历史风云，流淌着红色基因。罗章龙、杜孟模两任建党早期北京大学和北京东城区委负责人，辛亥革命元老张钫、革命党人李瑜如、李俊甫，爱国将领张轸，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胡万杰，革命烈士李萍、郭向新夫妇等都曾先后居住于此。

双龙巷64号，就是杜孟模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战争时期曾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封的地下秘密工作站，如今是杜孟模故居纪念馆，成为开封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杜孟模是中共早期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却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工作，这是为什么呢？

杜孟模，字宏远，1904年生于河南杞县，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曾在北京、济南、开封等地开展和领导民主革命、抗日救亡活动，长期以教育工作者身份从事大量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以后，杜孟模在开封高中任教，之后数年留在开封开展地下工作。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杜孟模冒险组织开封高中教师声援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他在进步学生中组织党的外围团体“社会科学读书社”，并在双龙巷家中宣传革命真理和党的抗日主张。在他的教导下，一大批进步学生包括其兄弟姐妹都从这里出发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双龙巷内的这座“大学教授寓所”还经常秘密向豫皖苏区党委提供重要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杜孟模回到开封。解放战争期间，杜孟模领导参与了河南大学进步师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革命运动，指导学生创办进步杂志。1945年8月到1946年7月，杜孟模任黄河水利专科学校副教授；1947年3月，根据党的指示，杜孟模与王毅斋、李俊甫、卢志国等共同组织成立了河南省民盟地下支部，开展民主运动，并秘密向豫皖苏区党委提供情况，为配合开封和河南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8年10月25日，开封解放后，时任开封市委书记吴芝圃来到杜孟模家。杜孟模和吴芝圃是老同学、老同事。从杞县老家读私塾到开封二中上新学，从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到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两人一直战斗在一起。

吴芝圃被请进堂屋，两人单独谈话。杜孟模提出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以何种身份工作，吴芝圃略加思考后说：“还是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对新政府建设比较有利。”

从此，杜孟模遵照组织的意见，一心一意地当好“民主人士”。子女都不知晓他的这段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杜孟模的工作虽多次变动，但一直没有离开教育事业和统战工作第一线。他注重引导学生培养高尚的人品和道德，走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道路，从事高等数学教学工作近20年，教学成果显著，桃李满天下。杜孟模历任开封高中校长、河南大学教授、开封市副市长、河南省数学学会理事长等职。1956年，他任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副院长兼教务长，1958年调任郑州大学教授，1959年当选为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和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64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双龙巷杜孟模故居纪念馆，展示了杜孟模一生的杰出革命贡献、生平事迹及物品：政府红头文件、教学备课讲义等。让社会各界人士可以详细了解到杜孟模的一生，同样也是爱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有展示物品均为杜孟模、段子彬夫妇及亲属后代的珍藏，包括夫妻二人生前的衣物用品、工作手记、日常生活照片、政府文件、学术著作、教学备课讲义，同时也包括了杜氏家族诸多名人的珍贵历史资料。

故居门楼主体呈现蓝灰色，砖木结构，其造型和饰面极具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特色，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它的门楣。古时的门楣大多标注主人家的姓氏或身份，但杜孟模结合时代的发展，门楣只是精雕了“平安”二字。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陈独秀端午节感慨作诗

庞国翔

抗战时期，重庆江津是国民政府规划的“迁建区”，接纳诸多从北京、天津、上海以及安徽、江苏等沦陷区迁来的文化教育机关。一大批文化名人、专家学者等客居江津。这些人中，许多是陈独秀当年在北京、上海时的下级或学生或文朋诗友，有的是他在大学任教时的同事。那时，陈独秀可谓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他们到了江津后，举目无亲，加上家仇国恨，于是，每逢节日就会相互聚会。每次聚会前，他们都会相约从江津县城或白沙镇或德感镇等地到偏远的石墙院看望陈独秀，或干脆就在陈独秀处聚会。这对当时处于低谷期的陈独秀来说，犹如一剂良药，给他孤寂痛楚的身心增添了几丝慰藉。

从1940年底开始，已62岁的陈独秀疾病缠身，身体每况愈下。他喜欢豪饮，但只要一饮，就会咳嗽不止。于是，他的这些文朋诗友为了他的身体，就劝他少饮酒，与他相聚饮酒的次数也开始减少。

1941年农历五月初五，正是传统的“端午节”。江津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国立九中教师何之瑜、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教授、国立编译馆编辑台静农、魏建功等人相约相聚于江津县最大的水码头白沙镇。他们上午在白沙长江边观看龙舟赛，下午为纪念屈原设酒聚饮。也许他们事前是想到老师陈独秀的，但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和其他诸多原因，就没有邀请他参加，也没有事前告知，就“单独行动”了。

白沙镇离陈独秀居住的鹤山坪石墙院不远。端午节晚上，陈独秀家姓焦的伙夫从白沙归来，将周光午、何之瑜等人相聚白沙镇为屈原祭日相聚之事告诉了陈独秀。陈闻知此事，长久沉默不语，随后提笔写下一首《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
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没过几天，周光午、魏建功等人偶然读到陈独秀的这首诗，这才认识到陈独秀以为这些朋友都不需要他了。于是，他们专程从白沙镇和德感镇集中，带着两壶江津烧酒“老白干”和鸡鸭各两只作礼物，来到鹤山坪石墙院看望陈独秀，陈独秀的心绪才有所改变。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

姜义军

1935年2月，中央苏区陷落前夕，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而暴露了真实身份。同年6月18日清晨，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36岁的瞿秋白神态自若地走到一处绿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着说：“此地甚好。”尔后，唱着自己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英勇就义。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始于1920年8月。当时，他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在莫斯科，瞿秋白被许多新鲜事物所吸引，其中之一，就是苏联人民时常高唱的《国际歌》。他认为，《国际歌》坚定豪迈的歌词、庄严雄浑的旋律，唱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共同心声。当时，《国际歌》在中国已经有了两种译文，但由于译文晦涩，一直没能传开。瞿秋白下决心重新翻译，要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喜爱的战斗歌曲。

1922年12月，受陈独秀邀请，瞿秋白启程离开莫斯科回国工作，次年初到达北京。回国后，瞿秋白不顾鞍马劳顿，就着手重译《国际歌》。他一遍遍地斟酌原文，一字字、一句句地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又找来一台风琴，反反复复地弹唱，直到他认为恰当地配上了乐谱，才定下一句。

当译到“国际”一词时，难住了瞿秋白：这个词，外文是很长的一串音节，可是汉语里就是这两个字、两个音，如果照译，歌词里就只能译成“国际——，就一定能实现”，这样是很不好唱的。怎么办呢？瞿秋白在小屋子里踱来踱去，哼着、想着。忽然，他停顿脚步，又疾步回到琴边，娴熟而有力地又弹了一遍，与此同时唱出“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这样，他用音译的办法，解决了中外文歌词音节不匹配的难题。

后来，瞿秋白曾告诉朋友说，“国际”这个词，在西欧各国文字里几乎是同音的，现在汉语用了音译，不但能唱了，更重要的是唱的时候可以和各国的发音一致，这样就可以收到中国劳动人民与全世界的劳动者“万口同声、情感交融”的效果。就这样，瞿秋白译好了全文。歌声在回荡着、召唤着：“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胡适大度二三事

黄山

胡适主持北大工作时，校务繁忙，遭遇过一些尴尬事。但由于胡适的宽容大度，这些事后来都被人们传为美谈。

一次，胡适准备在北大接待几位重要的外宾。他前一天就叮嘱秘书小陆第二天早点到学校，一定要把会客厅打扫干净，并准备一些水果。小陆答应得好好的，却不料，一向做事勤勉的小陆第二天偏偏睡过头了，更糟糕的是会客厅的门锁钥匙只有他有。

那天上午，当胡适兴致勃勃地引着外宾来到会客厅门前时，才发现会客厅的大门还锁着。胡适灵机一动，当即邀请外宾们先参观北大图书馆。与此同时，胡适悄悄派人去找秘书小陆。等胡适他们参观完北大图书馆之后，刚好小陆也赶到了会客厅。

就这样，胡适不动声色地把尴尬给掩饰过去了。

事后，秘书小陆一直想给胡适道个歉，可胡适绝口不提这件事。从此，秘书小陆做事比以前更加勤勉周到了。

红学家周汝昌学生时代年轻气盛，当时还未在红学界崭露头角的他曾给红学大家胡适写信，大胆地批评指出胡适红学研究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

胡适不但给周汝昌回了信，充分肯定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一些心得体会和观点，还鼓励他坚持深入地研究红学。后来，胡适还向报刊编辑部和红学界推荐了周汝昌的文章。

胡适和鲁迅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界的两颗耀眼的巨星。他们在做人做事作文的风格理念上是不同的，而崇拜、喜欢、追随他们的“粉丝”们的好恶也有所不同。

曾有好事之徒在胡适面前故意挑拨是非，添油加醋地说鲁迅在某某场合、某某文章里又含沙射影地说胡适坏话了，还煞有介事地提醒胡适要提防鲁迅，甚至还有人怂恿胡适写文章回击鲁迅。

胡适一概不理睬这些闲言碎语，依然在很多场合对鲁迅大加赞赏，并表示敬佩，弄得那些想搬弄是非的人也觉得自己的挑拨实在也没什么意思了，以无趣收场。

文人轶事 WENRENYISHI

郑振铎抬杠

沈治鹏

据《季羡林传》记载，1951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组织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和缅甸访问。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出访代表团，周恩来非常关心组团的工作，审查很多细节的安排。为出访，前后准备了半年多时间，在外访问又是四五个月。代表团团长是丁西林，郑振铎、钱伟长、冯友兰、季羡林、陈翰笙、吴作人、常书鸿等十多位为成员。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常工作生活在一起。

郑振铎身材高大魁梧，说话声音洪亮，为人热情、率性耿直。他同谁都谈得来，喜欢与人辩论，有时也说一些歪理。爱开玩笑，尤爱抬杠。抬杠时自己却一本正经，他同别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团中爱抬杠者大有人在，于是代表团成立了抬杠协会，简称“杠协”。大家想选一个会长，以领袖群伦。虽说群雄际会，就抬杠而言，团员们都认为郑振铎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充分酝酿之后，他全票通过，荣膺抬杠协会会长。郑振铎不负众望，在他的领导下，团中“抬杠事业”兴旺发达，笑声不断。

郑振铎与冯友兰年龄相仿，可后者看上去很威严，不过也不时说点笑话。因冯友兰长须飘胸，郑振铎就常开他的玩笑，经常喊冯先生为“大胡子”。有一次，理发师正在给冯先生刮脸，郑振铎走上前去，不苟言笑，连声对理发师发出指令：“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先是一愣，随后失手，真的把胡子刮掉一块，一下惹得旁边的群雄大笑。冯友兰只是微微一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可见冯先生威严中不失大度包容的气概。